

【史学博士论坛】

美国早期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双重构建

颜 震

(吉林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美国早期历史体现为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双重构建。在殖民地时代, 美国经历了民族觉醒与帝国的初步建构。从《独立宣言》, 到内战结束后的阿拉斯加购地为止, 美国民族国家与帝国大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方面从主权国家的建立到国家体制的完善, 再到克服国家分裂的挑战、以内战的方式完成民族国家的重生; 另一方面, 从建国之初到 1812 年第二次独立战争确立国家扩张方向, 到大踏步扩张西部领土并最终贯穿北美大陆, 完成大陆帝国的构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 美国民族国家与帝国的构建体现了一种同步进行、又有着复杂相互影响的特征。

【关键词】 美国; 帝国; 双重构建 “天定命运”

【中图分类号】 K7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2013)03-0093-05

The Co - Building of American Nation - State and Empire , 1776 - 1867

YAN Zhe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Art , Jilin University , Changchun , Jilin 130012 , China)

Abstract: The nation - state building and empire building ran at the same time in early American history. In colonial time , America has experienced the weakening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ook the early step toward an empire. From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ill the end of Civil War and Alaskan Purchase , there existed three developing stages for American nation - state and empire. All of these developments reflected an intermingled while mutually influenced co - building of American nation - state and empire.

Key words: U. S. A; empire; co - building; Manifest Destiny

美国是一个民族国家? 抑或一个帝国? 自冷战结束, 尤其是 9·11 袭击及反恐战争以来, 学术界见证了关于美国“新帝国”研究的兴起。无论是赞美帝国的合法性, 还是批判帝国的丑恶面, 人们已经无法忽视当今美国所主导国际体系下帝国的问题。正因为如此, 笔者将目光转向美国早期历史, 试图寻找美国民族国家与帝国的渊源。如斯塔夫里阿诺斯 (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 所说, 美国革命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创立, 而在于创立了一个新的、不同类型的国家。美国脱胎于欧洲的历史与文化传统, 独立于主权民族国家的大时代背景之下。毫无疑问, 美国的立国初衷即是建立一个与欧洲国家平等、享有完全主权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一点不仅通过《独立宣言》、《邦联条例》, 以及《联邦宪法》等立国文献得到阐述与肯定, 同时也为独立战争、与法国结盟等反抗母国的暴力手段得到证明。同时, 美国也是特殊的。作为英帝国在北美大陆的组成

部分与继承者, 美国在立国之前就开始了在北美的扩张。伴随着“美国例外论”的滋长, “天定命运”给这个特殊的人群在美洲大陆的扩张作了注脚。建立大陆帝国的使命深植于美国的民族性和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 而帝国构建过程中的领土扩张, 也为国内矛盾和紧张制造了新的战场。美国建国之后的几十年内, 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双重构建成为其早期历史发展的相互交织的两条重要线索。

一、美国民族觉醒与民族国家的初步建立

自从第一块英属殖民地弗吉尼亚, 以及 1620 年新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建立开始, 英国移民及其后代构成了这块大陆数百年间族群的主体。在殖民地早期, 甚至在独立战争爆发前的大部分时间里, 对母国的忠诚与认同始终处于显要位置。里亚·格林菲尔德 (Richard Greenfield) 认为, 北美人的民族主义在殖民地得到了充分发

[收稿日期] 2013-02-26

展：这种民族主义即英格兰民族主义；从新英格兰、波士顿、坎布里奇、弗吉尼亚、佐治亚等地名的起源可以看出北美人对“追求与英国相同的意识——对英国的认同——人们思恋家乡并渴望在大洋彼岸复制出一个他们珍爱的形神兼备的母亲形象。”^{[1](p.503)}“模范地忠于并落实英格兰的价值观，这一意识为各地移民所共有，同时是构成本土美利坚认同的一个核心要素。”^{[1](p.511)}

然而，对英国民族认同并不能完全取代本土北美人对这块土地逐渐增长的感情。“各殖民地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便由出生在北美土地上的几代人占支配地位；他们不了解英国，感情倾注在他们视为故乡的当地。”^{[2](p.100)}不仅第二代，而且此后几代移民与母国的感情愈加疏远，新增加的移民更多对英国或英国政府并不友好。人数仅次于英格兰人的苏格兰和爱尔兰人是为了躲避英国政府的统治来到北美，同样还有大量德国移民。除此之外，占据相当数量的非洲裔移民是作为奴隶贩卖到北美。这些少数族裔尽管社会地位较低，但人数规模不容忽视。

在这种认同转换过程中，宗教信仰的作用不能忽视。大英帝国的子民们选择移民到美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寻找信仰的自由。曾开创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并多次担任总督的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关于“山巅之城”的表述曾在无数场合被引用“我们必须认为我们应该是山巅之城。所有人都在关注着我们。”拥有执著信念的清教徒移民自然会把属于自己的殖民地与母国有所区分。事实上，来美洲以前，约翰·温思罗普与其他清教徒领袖就签署了所谓的《坎布里奇协议》，同意移民新英格兰的条件是带去皇家特许状和治理权，因此，拥有在英王权威下享有完全自主治理的权利^{[3](p.55)}。清教精神赋予殖民地人民一种彻底为上帝服务的义务，尽管这种义务并不完全和英国的主权相冲突，但已经在精神世界为美国人的诞生做了铺垫。后来，清教徒已不受英国国教牧师的戒律和国教牧师奢望的约束，渐趋独立；没有经过多少岁月，每个小教会都变成了一个享有自主权的教区^{[2](p.70)}。殖民地人民在忠于英国的同时，也意识到这块土地与母国的不同之处：殖民地享有比英国还多的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特别是宗教自由成为区别于英国，并进而产生美洲独特性意识的核心因素^{[4](p.126)}。

除了信仰之外，现实的利益对一个新的国家的诞生最为重要。在北美严酷的生存条件下，印第安人的威胁是殖民地走向团结的第一个催化剂^{[5](p.25)}。随着移民从商业殖民转变为土地殖民之后，移民们自然会和这块土地上的原著居民印第安人产生矛盾。在无数次对抗印第安人的冲突与战争中，各分散的殖民地由此进行联合。另一方面，由于英国颁布《航海条例》，规定非欧洲地区进出英国的货物需用英国船运输，并向进出殖民地的

欧洲货物课以重税，意图降低殖民地对母国的竞争力。

曾以身为英国人而骄傲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8世纪60年代解释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缘何紧张时，谴责英国的贸易政策是想要控制美洲的商业^{[6](p.93)}。英国在构建其北美帝国时明确了其重商主义思想，肯定了一个原则，即殖民地的存在就是为了使母国受益和加强母国的力量^{[6](p.95)}。除了在经济和商业上限制殖民地的发展外，在同荷兰人、西班牙人、印第安人，以及法国人的战争中，也要求北美人民做出牺牲。在第一次奥格斯堡联盟战争，位于英法殖民地边界的殖民者承受了一定的人员损失。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殖民者伤亡近500人。尽管这两次战争对殖民地并没有造成严重破坏，但英国的帝国扩张与欧洲强国在美洲的利益冲突愈演愈烈，英法正式开展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北美殖民者付出了逾5000生命的代价，终于在影响深远的“英法七年战争”中，英国在北美决定性地击败了法国。而以华盛顿为代表的殖民地人民在这场战争中接受了锻炼，如今，“他们的自信力远远超过以往；可能再次对帝国计划进行抵制，甚至可能对帝国的约束提出挑战。”^{[6](p.134)}

对大英帝国的挑战最终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多年战争令英国负债累累，进而通过以下若干方式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1. 通过《糖税法》、《印花税法》、《茶税法》等直接激化殖民地与英国矛盾的举措；2. 为防止与印第安人的冲突而禁止开拓新增加的西部领土；3. 采取武力镇压的方式应对殖民地武力抗税等运动。正因为种种忽视北美利益的不当举措，使通过战争而本应得到加强的英美关系比以往更要脆弱。北美人民深刻体会到独立与平等的重要意义，同样身为大英帝国的子民却无法享受同等的待遇，因此，当务之急是获取与母国的平等地位。通过不断的斗争，他们发现只有独立才能从根本上确保人身自由与平等。而长期的斗争使联合成为赢得独立与平等唯一且必须的选择。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的召开、1775年打响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到1776年《独立宣言》的起草，标志着殖民地之间正式联合的形成和与英国的决裂的开始，“英国和美国……终于开始将对方视作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7](p.122)}。一个崭新的民族国家初步建立在这块新大陆上。

二、帝国意识的产生与发展

有关于美国帝国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目前，学术界关于美国帝国的起源主要集中在19世纪后半期尤其是以美西战争为起点来叙述美国的帝国构建。冷战后尤其是21世纪初美利坚“新帝国主义”的争论占据着学术讨论的前沿。然而，我们可以从美国早期历史探究帝国意识的萌动与发展，这对美国帝国构建的研究，以及对

理解当下美国世界霸权的起源有所助益。

美国的帝国意识有着多种不同的起源与解释。首先，北美大陆的发展是英国早期商业扩张精神的产物。某种意义上讲，早期来自英国本土的北美移民所进行的开拓、垦殖与贸易活动是英国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约翰·洛克的“天然权利说”，帝国的扩张是国内繁荣发展的需要，因此，扩张是一个民族的天然权利。美国在殖民地时代和英国的北美扩张运动亦步亦趋，积极扮演着领土扩张的排头兵角色。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63年为英国征服加拿大而欢呼，认为法属殖民地被纳入英属北美殖民地领土范围可以满足美国人对广阔空间的需要。

其次，美国民族意识与独立意识赋予“帝国（empire）”一词新的含义。实际上，英国宗教改革期间，在“禁止向罗马教廷上诉法案”中已经提出英国是一个帝国，主要指新生的英格兰民族独立于教廷之外，拥有充分统治权的主权国家，即与欧洲其他国家平等的民族国家。因此，帝国成为民族国家的同义词。在北美，美国人从自身角度出发，对帝国赋予独特的理解，认为殖民地地方议会拥有和英格兰议会同样的作用，具有同样的职权，享有同样的权利。到18世纪70年代中，有些美国人提出帝国就是一种意义上的联邦，各有立法体系，联成一体共同效忠国王^{[8] (p. 116)}。在此，美国人将殖民地与英国本土视为相当的实体，是立法意义上平等的主体。

再次，“美国例外论”与“天定命运”是帝国构建的思想准备。美国人一开始就有着一独特的观念，即美国是上帝所选择领土，是新以色列，而美国人则是上帝的选民。选民不仅要用勤恳的劳动来证实自己的身份，同时也肩负着传播上帝福音，把世界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的使命。这一观念已经从“山巅之城”的表述中得到证明，北美的宗教信仰成为孕育这一观念土壤。清教徒无法在祖国继续宗教改革、实现理想基督教世界的梦想，并且屡屡遭受英国官方的迫害，因而只好选择离弃故土，来到原本荒芜的北美。美国学者希奥班·麦克沃伊-利维（Siobhon McEvoy - Levy）认为，“美国例外论”来自于“山巅之城”的梦想，而“天定命运”等思想则反映了这种例外论思想。“美国例外论”随着美国力量的壮大而逐渐成型，并对美国的国内政治发展与对外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8] (p. 23)}。王晓德认为，“美国例外论”体现在三个不同的方面：第一，北美大陆在开拓过程中形成的美利坚民族与其他民族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第二，北美大陆形成了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政治制度的体制，美国采取了世界上能够保证公民的民主自由的最好制度；第三，正是北美大陆地理和人文环境的“特殊性”和“独特性”，美国社会逐渐形成了区别于其他社

会的文化价值观。“天定命运”与“美国例外论”相呼应，秉承传播上帝福音，拯救世界的理念。美国建国之后所进行的对印第安人的战争，路易斯安那购地，1812年战争、美墨战争，以及西进运动都证明了美国对建立大陆帝国的渴望。

事实上，在美国打败英国、赢得独立战争的那一刻，并没有构建完全意义上的主权民族国家，13个独立的州之间正在为未来国家的形态争吵不休。但这时的美国已经走在建构帝国的道路上。美国13个州中大部分都在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和密西西比河以东拥有从英国手里获取的土地，并在建国之后陆续交还给国家政府。在接下来夺取北方、西方乃至南方的领土中，美国与印第安人、英国人之间展开了大大小小的冲突与战争。

三、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双重构建（1776—1867年）

“美国例外论”与“天定命运”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美国例外论”突出了美国区别于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特性，而“天定命运”则为美国大陆帝国的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把美国打成一个理想中的国度与一个伟大的帝国成为美国早期历史的特点，同时也成为一组相互交织的矛盾共同体。透视内战结束前的美国早期历史，可将美国民族国家与帝国的构建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主权国家的建立与帝国的起步（1776—1815年）

从签署《独立宣言》，到1783年《巴黎和约》的签订，历经数年艰苦的战争，殖民地正式脱离英国的统治。但并非完全意义上美国的诞生。虽然大陆会议在1776年签署了具有宪法性质的《邦联条例》，但却承认新独立的各个州的自主权，规定对条例的修订需要所有州一致同意，且没有赋予国会收税和筹款的权力。即使如此，《邦联条例》的施行依旧步履艰难，如马里兰州直到1781年方正式批准加入邦联。但不可否认的是，《邦联条例》在独立战争最紧要的时刻起到了聚拢人心、团结各个州的作用，搭建起一个新生国家的框架。除此之外，邦联会议在1785年通过了两项意义深远的法律——《官地款约》和《西北领地条例》，创造了地方政府制度，以方格制的形式确立了新增领土的地产界限，为白人移民进程带来了秩序和稳定^{[7] (p. 151)}，也为19世纪美国领土扩张提供了制度保障。

然而，《邦联条例》下的国家政府过于松散且缺乏权威，几乎无力指定外交政策、保证国防安全、缔结商业条约以及处理革命所遗留的债务问题^{[9] (p. 31)}。1787年，55名代表齐聚费城商讨起草《联邦宪法》。他们最希望的是建立一个新且完美的联盟，从而可以产生一个

可以从整个大陆、而非个别州的私利思考问题的开明的领导层^{[9](p. 32)}。《联邦宪法》的诞生确立了国家主权，从法律上明确了中央与州之间的权力分配，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在宪法草案的辩论过程中，以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为首的联邦党人，在美国主要报纸上连载为宪法辩护的文章，阐述建立一个强大的共和国和分权制度的重要性。后来以《联邦党人文集》的形式结集出版。

关于《联邦宪法》的争论导致了党派政治的产生。美国政治体制在是否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争论中向前发展。但客观地说，无论是联邦派执政，还是后来的共和党上台，都没有超越宪法所规定的权力框架，美国依旧稳步发展自身的经济和商业，国家意识与民族凝聚力也在逐步提升。同时，国内的政治争论并没有阻止美国领土扩张的步伐，美国抓住一切机遇实现“天定命运”。1803年，杰弗逊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与拿破仑法国签署条约，实现路易斯安那购地，使美国的领土扩张了近一倍。此同时，国内政治争论被掩盖在愈发不利的国际政治环境中。美国在向西部新增领土的扩张中不断与印第安人发生摩擦，在海上和美加边界与英国人的冲突也在升级。美国追求贸易权益，以及对圣劳伦斯河北土地的渴望与英国在北美利益的冲突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的爆发。而在战争中受挫的“天定命运”感情，以及被激发的民族精神最终是美国人将之称为“第二次独立战争”。在这次战争之后，美国也修正了其领土扩张的方向，将注意力主要转移到西部以及南部的西属佛罗里达。

在关于构建帝国的理论上，联邦党人与以杰弗逊为首的共和党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杰弗逊设想了一种没有中央集权与主宰世界野心的共和制帝国，这种帝国信奉自由，是“一个通过利益和情感的纽带团结在一起的由各个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展的联邦(union)”^{[10](p. 3)}。而联邦党人则担心这样一种松散的扩张式帝国只会加剧国家各部分的离心力，进而会毁掉追求强国地位的民族国家。从美国未来的历史看，这种矛盾与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的政策划定了范围：打着自由旗号进行大陆帝国的构建鼓励着美国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的，但也为国内的争吵与分裂埋下了隐患。

(二) 国家政治的发展与大陆帝国的扩张(1815—1848年)

1812年战争的结束为美国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和领土扩张带来了空间。在战争结束后最初的几年里，美国经济经历了一度繁荣，主要归功于资本更加雄厚的第二国家银行的成立，国家拨款修建的公路等“内部改进”，以及白人向西部大规模的移民。在战后短短6年时间里，西部先后成立了印第安纳州、密西西比州、伊利诺伊州、亚拉巴马州和密苏里州等五个州。与此同时，美国在战

前严重依赖农产品出口和工业产品进口的经济模式不复存在，战争促进了国内工业生产能力的进步，导致了战后美国工业的蓬勃发展。美国经济改变了以往过度依赖国际贸易的态势，国内贸易发展迅速。

然而，向西部移民以及新的州加入联邦使一个长期隐藏的问题得以暴露。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北方与种植园经济为主导的南方在对西部的竞争中采取不同方式。北方倾向于让新成立的州成为自由州，而南方则为蓄奴州。北方与南方的分歧在1819年由于密苏里州的加入而激化。当时密苏里州的蓄奴制已经得到确立，6万人口中约1万人是奴隶。如果以蓄奴州的身份加入联邦，那么北方和南方两种体制下州的数目将失去原本1:1的比例。最终，通过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以自由州缅因州的加入和以北纬36°30'为自由州和蓄奴州分界的形式达成了南北妥协，挽救了联邦的分裂。杰弗逊对此却并不乐观“联邦不同地区近来出现的分裂现象，让我担心，可能永远无法消除。”^{[7](p. 231)}

两种经济体制造成的南北矛盾暂时被掩盖，美国目前最大的国内政治就是对外扩张。从1810年到1848年，美国大踏步地向西部扩张领土。1819年，美国通过武力入侵和外交手段迫使西班牙签署《横贯大陆条约》，把东、西佛罗里达割让给美国，解决了路易斯安那购地以来与西班牙之间的领土争议，将密西西比河真正变为美国的内河。

19世纪30年代，通过多年持续的移民开发和“独立运动”，德克萨斯脱离墨西哥获得独立，最终在1844年加入美国。德克萨斯加入美国成为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发生战争的主要原因。1846—1847年，美国兵发三路攻入墨西哥境内，并于1847年攻占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迫使墨西哥政府割让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犹他州、亚利桑那州，以及新墨西哥、科罗拉多和怀俄明各州的一部分，面积达50多万平方英里。与此同时，美国与英国通过谈判以北纬49°为界划分了美加边界，从而成功获取面积为50万平方英里的俄勒冈地区。至此，美国通过武力、外交谈判和购买等多种方式将美国的领土在地图上扩张到太平洋沿岸。

(三) 国家统一的维护与大陆扩张的终结(1848—1867年)

大陆帝国的构建与“天定命运”论的甚嚣尘上最终并没有遮掩住美国国内政治的分裂。19世纪40年代，有关奴隶制存废的辩论进入到美国政治的中心舞台。“这种情形的发生……是由于国家领土扩张的结果所致。”^{[11](pp. 595-596)}对于西部新增领土的不同态度重新使南北双方的矛盾激化。1850年，加利福尼亚要求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联邦，但南方却表示反对。参议员亨利·克莱(Henry Clay)提出一向包含四个主要内容的计划：

将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废止华盛顿特区的奴隶买卖；制定更为严格的新联邦法，允许奴隶主重新抓捕逃跑的奴隶；在墨西哥割让领土上的奴隶制问题交由当地白人处理^[11]（pp. 611-612）。这份被称为1850年妥协的方案尽管暂时缓解了矛盾，但接下来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恢复了原本禁止奴隶制的这一地区，从而激怒了国会中的反奴隶制议员。美国的政治进入新一轮的重组：种植园经济为主体的南方成为民主党的天下，而逐步工业化的北方则出现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的兴起。美国新型两党制的产生反映了美国经济生活的分化，也让政治分化派上了台面。奴隶制的存废问题成为国家分裂的导火索。奴隶制的存在是对美国自由精神和宪法原则赤裸裸的践踏。但在“天定命运”，以及盎格鲁种族主义盛行的年代，加上地方自治主义与个人意志自决的掩护下，奴隶制很顽强地继续存在于美国的南方。林肯在与北方著名政治领袖道格拉斯的辩论中强调《独立宣言》适用于任何地方的所有人。另一些激进废奴主义者如约翰·布朗则公开用武力暴动反对弗吉尼亚的奴隶制。最终南北双方的矛盾在林肯当选总统后变为不可调和。南方各州纷纷宣布退出联邦，并组成邦联政府，准备与北方开战。一场由奴隶制存废的争论所导致的分裂，如今发展成为美国民族国家存亡的最大挑战。

南北战争作为一场美国内战，为美国的历史发展划分了一条清晰的界线：北方的胜利与联邦重归统一让这个国家经历了一次新生。美国学者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认为：“（这场战争）让之前并不是一个民族的美国现在变为一个民族……美国曾经是一个人造的国家或州的集合，由经协商所制定的协议和契约、特许证及承诺所结合而成……如果说早期的美国人有民族性，那么他们只是英格兰人（更准确说是不列颠人）。《独立宣言》所缔结的契约也没有创造一个民族。”^[12]（pp. 1-2）美国用最激烈的形式解决了民族国家构建中最大的障碍，同时解决了新增领土的制度问题，为美国之后大规模开发西部铺平了道路。当然，在这一时期，美国继续在西部进行领土扩张：向西部新增领土的移民带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促使联邦政府开始进行铺设太平洋铁路已连接东西的庞大工程，即使内战也没有阻止工程的开工与建设；以国务卿威廉·西华德（William Seward）为首的部分美国人已经在构想太平洋帝国的远景，认为美国大陆扩张完成后，下一个目标则是太平洋与远东地区，并力排众议，于1867年以低廉的价格从俄国手中买下了荒无人烟的阿拉斯加。至此，美国在北美大陆的大规模

（作者系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

领土扩张宣告终结，大陆帝国的构建基本宣告完成。

结 语

纵观美国建国后90年的历史，我们发现，美国在建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也在进行着帝国的构建。这种构建不仅仅是同步进行，而且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从理念维度看，美国的独立与建国以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为指引，其独特的使命观和“天定命运”论为美国领土扩张奠定基础。贯穿美国早期历史，尽管存在着争议，进行领土扩张始终是大多数美国人的共识。从利益的维度来看，美国民族国家的构建需要13个州的联合，并需要构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政治领导者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客观上为开拓美洲大陆提供了必要条件。与此同时，从政治手段的维度来看，宣扬“天定命运”论、种族主义及其他扩张性言论有利于进行国家与民族意识的团结，美国也在19世纪40年代经济危机利用领土扩张来转移人民的视线。这种“有美国特色的”的国家构建和帝国构建之路也为研究19世纪后半叶，乃至20世纪和21世纪美国历史提供了某些线索和启示。

【参 考 文 献】

- [1]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 民族主义: 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0.
- [2] [美]查尔斯·A. 比尔德, 玛丽·R. 比尔德. 美国文明的兴起(上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3] Rod Gragg. *Forged in Faith: How Faith Shaped the Birth of the Nation, 1607-1776* [M]. New York: Howard Books, 2010.
- [4] 王立新. 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J]. 历史研究, 2003 (4).
- [5] 何顺果. 美国文明三部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 [6] [美]詹姆斯·柯比·马丁, 等. 美国史(上册)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7] [美]艾伦·布林克利. 美国史(1492—1997) [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9.
- [8] Siobhon McEvoy - Levy.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Public Diplomacy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M]. New York: Palgrave, 2001.
- [9] Sean Wilentz. *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Jefferson to Lincoln*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5.
- [10] [美]彼得·S. 奥鲁夫. 杰弗逊的帝国: 美国国家的语言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 [11] [美]埃里克·方纳. 给我自由! 一部美国的历史(上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12] Paul Johnson. *Civil War America, 1850-1870* [M].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11.

【责任编辑 张晓校】